

文史天地®

高品位人士读本 还历史本来面目

2012.3

- 香港回归前夕的港台百态
- 高岗人生中的三次偶然
- 红九军团贵州猫场之战
- 大跃进时期的“白旗”板话

全国“百种优秀期刊进连队”入选期刊
贵州省第一届十佳优秀期刊



国内刊号: CN52-1135/K
国际刊号: ISSN 1671-2145

定价: 7.5元

为官须警惕“精神贿赂”

刘建明

东晋桓玄称帝时,有一段颇为滑稽的故事:一日,桓玄登上大殿,当在龙位就座时,御座突然塌陷,群臣大惊失色,桓玄也极感惶恐。侍中殷仲文站出来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深厚,连大地都载不起了,所以御座才陷落下去。”顿时桓玄转忧为喜。自此,殷仲文便成了桓玄的得意侍从。

无独有偶,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微服外出,路遇彭友信,正好雨过天晴,万里长空出现了一道彩虹。朱元璋兴之所至,信口吟了两句:“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雨系天腰?”彭友信灵机一动,马上应声接了两句:“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把朱元璋比作“玉皇”,说“万里长空架彩桥”的,就是你这位“昨夜銮舆出”的“玉皇”。朱元璋听后,龙颜大悦。吟诗的第二天早晨,就封彭为布政使。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殷仲文会说话让桓玄转忧为喜也好,还是彭友信会接诗让朱元璋龙颜大悦也好,靠的就是对主子实行“精神贿赂”。他们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心理,抓住了主子爱听好话、喜欢听顺耳话的弱点,从而把握机会,百般迎合,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大献溜须之词,以取悦主子,最终果然赢得了主子的信任和重用。

所谓“精神贿赂”,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拍马屁、抬轿子、戴高帽等。与物质贿赂赤裸裸的利诱相比,精神贿赂更具形式上的灵活性和行动上的隐蔽性。它只需一张巧嘴、一个笑脸、一架媚骨、一副心眼外加手勤、腿勤就行,它“赠送”的不是财物,而是阿谀奉承之言,拍马溜须之举,更容易使人在精神和思想上放松戒备和警惕,变得昏昏然、飘飘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掉入温柔的“陷阱”,最终被行贿者牵着鼻子走。所以有哲学家早就提醒人们:“奉承者不用花钱,但绝大多数的人却不自觉地向奉承者付出巨款。”

作为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少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自然就会成为“精神贿赂”的重点对象。如果领导干部自身稳不住神,沉不住气,分不清良莠,辨不明真假,对“精神贿赂”缺乏免疫力,往往就会导致失聪、失明、失察、失策,不仅会助长溜须拍马的不正之风,严重败坏党风政风,而且还会做出有损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错事、傻事来,最终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

因此,领导干部面对“精神贿赂”,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引起高度警惕,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培养高尚人品,提升思想境界,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让自己耳聪目明,心清气正,从而使“精神贿赂”没有市场。

主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

主办:贵州省政协办公厅

协办: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英利医药有限公司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顾问:王正福 王思齐 龙志毅 计佑铭

编委会主任:陈海峰

编委会副主任:李月成

编委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韦林 邓应明 王永进 王黎明 石超 刘晓

刘玉芳 刘朝容 肖向阳 李建国 李跃荣 何建新

陈石 陈卫东 陈庆义 陈凌华 吴世祥 非大伟

张定书 杨正明 杨继红 胡巍 封孝伦 侯正茂

姚钟伍 袁仁国 唐方信 唐昆雄 魏凤英

社长:姚钟伍 主编:吴世祥

副社长 副主编:刘玉芳

文字编辑:姚胜祥 谢建平 翁泽红 王封礼

电话:0851-6813033

美术编辑:刘 丹 兰 亮(执行) 杜 宁

经营中心主任:杨朝勇(0851-6812013)

办公室副主任:徐春生(0851-6823282)

经营中心副主任:吴 昱(0851-6810687)

发行部主任:胡 进

广告部主任:杨朝勇(兼)

法律顾问:天职律师事务所陈朝洁律师

出版:文史天地杂志社

国内刊号:CN52-1135/K

邮发代号:66-57

发行:贵州省报刊发行局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际刊号:ISSN 1671-2145

国外代号:M7505

广告经营许可证:黔工商广字 0244 号

广告发行代理:贵州文史天地经营中心

印刷:贵阳经纬印刷厂

每月 3 日出版

传真:0851-6823282

地址:贵阳市北京路 141 号 邮编:550004

邮箱:wstd3282@sina.com

博客:http://weibo.com/wenshitiandi

网址:http://www.wstdw.com

境外售价:5 美元

卷首论坛

为官须警惕“精神贿赂”

刘建明 / 1

特别话题

香港回归前夕的港台百态

周天柱 / 4

特约专稿

大跃进时期的“白旗”板话

张志善 / 11

荒唐岁月多荒唐,猪耳可当飞机场。板话写下真历史,警示后人切莫忘。

人物春秋

遵义会议前夕被起用的四位红军将领

张小灵 / 14

长征途中的黎平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说,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高岗人生中的三次偶然

杨 凯 / 18

“敢捋虎须”的地质博士谌湛溪

周礼荣 周禹龙 / 21

史林漫步

张君勱:“一代宪章空有愿”

王学斌 / 24

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但他想为国家做一点事的热忱,还是令人可敬的。

“变色龙”民国湖南省主席何键

朱继光 陶仁人 / 30

漫话皇帝

杨坚:被历史掩盖的“多面皇帝”

刘振修 / 35

杨坚逼北周宣帝退位,演了一出“被劝进”当皇帝的闹剧。有了如此经历,他的多面性也就好理解了。

壮志未酬的变法皇帝

张家康 / 38

名臣名将

北宋将门进士杨敞

杨 立 / 44

天地间莫非文史 文史中别有天地

北宋“圣相”李沆
和尚谋士姚广孝

晏建怀 /47
曾庆豪 /50

历史大案

李提摩太与“丁戊奇荒”

袁灿兴 /52

这篇文章中的传教士，似与我们成见中的传教士相去甚远。
而“以实心行实事”，更可让一些当代的慈善机构脸红。

史海钩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谷小水 /56

史海拾贝

第一个外国籍宦官朴不花

史宗义 /59

战场回眸

红九军团贵州猫场之战

胡凌 /64

文史随笔

讽刺联与清代科场

陈正贤 /68

清末文人的饭碗

何诚斌 /73

国外高端

哈尔：靓丽时尚的巴基斯坦首位女外长

周有恒 /75

长篇连载

“四八烈士”黄齐生(连载3)

王鸿儒 /80

编读之窗

征联欣赏等

泽红编 /87

文史快车

影像站等

建平编 /89



★若发现本刊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费用由厂家承担。联系电话：(0851)6300007
您若错过邮局订阅时间，可随时汇款至本社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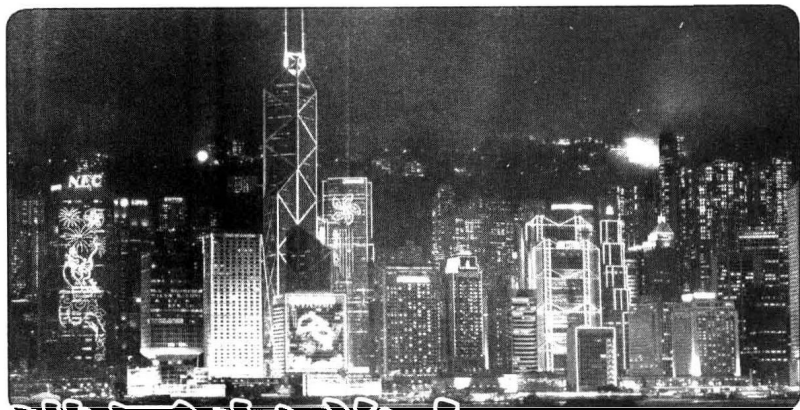
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授权 天职律师事务所陈朝洁律师声明

本律师经文史天地杂志社授权发表如下声明：

凡是来稿，本社不查不退，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所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文责自负，本刊不承担任何侵权及连带责任。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并有权上网发布、结集出版，稿酬不另计。其他报刊转载本刊作品，请注明并在转载前通知本刊。否则，本律师将随时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代表《文史天地》杂志社追究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本期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本社联系)



香港回归前夕 的港台百态

周天柱

台湾“中钢”的环保措施,我们是否可以借鉴?

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统一伟业中举世瞩目的一桩盛事。1997年5至6月,根据组织安排,我随上海市总工会代表团赴台访问。当时我的身份是访问团顾问,学术职称为上海总工会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

作为大陆首个正式应邀访台的工会参访团,此次途径香港踏上祖国宝岛,足迹遍及高雄、屏东、台中和台北等地,虽来去匆匆,却也在“走马观花”中,有所思亦有所得。

香江剧烈阵痛

上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才相往来”的特殊状态。由于台湾当局人为阻扰,两岸不能直航,去台湾必

须绕行香港或澳门。1997年6月的香港,正处在回归前的剧烈阵痛中。

飞机在香港启德国际机场一降落,就明显感受到当时时局的紧张。停机坪、旅客通道、验证处、候机楼到处是头戴贝雷帽、身穿紧身防弹衣、手持微型冲锋枪的港英军警。他们往往两个人一组,来回不停巡逻,两眼毫无表情紧盯着面前的每一个人。右手食指紧贴冲锋枪的扳机上。似乎只要一有异常情况,大声喝令后,一梭子弹随时就会飞出枪膛。

令国人颇为气愤的是,巡逻的军警奉上司旨意,因人而异,极会变脸:对高鼻子、蓝眼睛的欧美旅客相当友善,和颜悦目,几乎有求必应;对于从内地来港的国人,却凶神恶煞,

脸面铁青,稍不顺眼,就用英语大声训斥。你若听不懂英语,毫无反应,他们就会动手用力拉扯,为此双方常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内地旅客无奈之际,便悄悄用普通话骂道:“看你们还猖狂得了几天。”

出了机场,接机的陪同再三告诫我们: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千万不要与陌生人搭腔。只见市内街道,冷风夹着飞沙迎面扑来。一辆辆草绿色军用吉普车上,军警架着枪在巡逻,不时飞啸而过,有时来回穿梭,气氛一片萧杀。

匆匆翻阅当时香港的左派报刊,让我最惊叹的是,英国人管治香港 150 余年的“一大成就”,是弄得香港人不知“国家”为何物,何为“香港史”。最为离谱的是,竟然有一个受港英教育的香港检察官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采取闭关政策,拒绝同外国做生意,才引起英国出兵攻打中国,中国战败把香港割给英国。检察官是如此,一般香港人呢?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发表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是:近一半人认为自己对香港历史的认识“一般”;另外四成多人认为“很浅”或“没有认识”;只有百分之七认为“非常深刻”。在这次调查中,对于有关香港基本历史常识的选择题中,只有三分之一记得香港岛是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的。

1967 年后,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全面转为“重英轻中”,切断年轻一代与中国母体的文化联系,向他们灌输符合英国殖民统治的价值观。学生须熟背英联邦国家的山川江河名字,却可以不知长江、黄河在何处奔流。即使开讲中国历史,多数学校也使用英语课本,光绪皇帝成了 K'ang Szu,慈禧太后更变成 Empress Dowager。

不过,随着九七回归临近,香港中小学校都已开始重新审查课程内容,教科书出版商也已着手重新编写课本。最大的变化是从“英国本位”变为“中国本位”,要让学生知道“五

星红旗”的含义是什么,“国歌”是怎么唱的,《香港基本法》是怎么一回事,也要纠正以前被英国人歪曲、隐瞒的历史。新教材还必须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讲到 1949 年之后的事情,不能把“中华民国”当作中国的国号,更不能讲授主张“两个中国”或“台独”的内容。

劳工力量真大

未去台湾前,对于岛内劳工状况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譬如说我们大陆省市县乃至每个企业都成立工会组织。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等大城市之外,有没有基层工会?担当工会干部该具备哪些条件?诸如此类的问题装满了我的脑袋。

首次赴台的考察交流,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从南往北,36000 平方公里的台岛虽说没走遍,但“管中窥豹”,粗线条的轮廓已浮现在脑际。在台湾,“劳工”概念非常广泛,凡靠劳动力为生的人都是劳工。以劳动形式分,可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前者即蓝领阶层,后者即白领阶层。当年岛内劳工人数约 800 万左右,占总人口的 37.6%,选民数的 57%。

为了强调 57% 这个数字的重要性,一位老资格的台湾劳工领袖在谈及全岛工会状况时,特意向我展示了一幅台湾地图。图上密密麻麻的黑点清楚地表明,台湾几乎每一市、县都有工会的旗帜在飘扬。热忱邀请我们访台的台湾工业中心高雄市总工会理事长陈政吉在当地是个风云人物。他介绍说:全市 135 万人口,劳工占了 60 多万。经 50 年的努力,工会会员从当初的 1600 多人发展到 1996 年的 22 万人。他特别强调:在台湾政坛,任何一党的“总统”候选人要想上台,都离不开劳工的支持。李登辉为竞选“总统”,耗资上百亿元(新台币、下同),声嘶力竭地作了上百场竞选演讲,才侥幸得了 50.8% 的选票。只要我们劳工齐心协力,绝对有把握支持或阻止任何候

选人上台。“小三子”发威，令人不敢小觑。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最深刻的活动是应邀参加1997年高雄市总工会代表大会。与会前陈政吉理事长告诉我们，台湾工会组织与大陆有点不同，在工会担任职务越高的负责人，所缴的会费越多。譬如说一般会员每年只要缴1000元（当时新台币与人民币之比为3:1）；身为理事为万元；常务理事5万元；副理事长20万元；而我是理事长，则至少要缴50万元。你会费缴得多，对工会的贡献大，你才有发言权。

在香港即将回归时首次参加台湾的总工会代表大会事关重大。我们事先向上海市委领导作了专题报告。高层领导指示：底线是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问题就在当时正处在香港回归极敏感时期，高雄总工会内的“台独”分子不甘心失败，借机闹场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甚至会越闹越凶。遇到此类突发事件该如何处理？大陆其他兄弟省市处置模式很简单，婉拒主办单位邀请，不参加会议。但这种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热情主人的盛情邀请却被粗暴地硬找不是理由的理由加以拒绝，那主办方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这对加强双方互动不利，与此同时，也丧失了一次绝好地做台湾人民工作的机会。

会前我与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经紧急会商做出以下两项重要决定：一是预估到高雄总工会代表大会按惯例在会议一开始奏“中华民国国歌”。我们与主办方讲明，因考虑到两岸政治制度现状，我方人员必须在“国歌”奏完后入场；二是预估到台方与会代表成分十分复杂，可能会有“台独”分子起哄捣乱。我方代表——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包信宝提前致辞后，以继续完成预定行程为由，全团人员先行退场。这两项决定既出席了大会，满足了主办方的请求，抓住时机，做了台湾人民工作，又可避免与闹场人员纠缠的尴尬场面。对此

主办方表示充分理解。

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我们比预定开会时间早到5分钟，显示客人对主人的尊重。在贵宾室静候“国歌”奏完后，即刻在全场热烈掌声中进场。高雄大会主席致开幕词时特别指出：上海总工会代表第一次参加高雄总工会年度代表大会是全体代表的荣幸。因贵宾要赶预定行程，特请上海总工会主席包信宝先生先行致辞。

容光焕发的包信宝主席首先代表上海百万产业工人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接着介绍了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巨变及当年上海总工会的几项重大活动，最后热切希望沪台两地工会加强互动，并盛情邀请在座的各位代表方便时多多到申城参访。短短6分钟热情洋溢的致辞，在雷鸣般掌声中结束。当欢乐乐曲响起，双方互赠礼品后，我们按预定计划退场，圆满完成了任务。

事后得知，我们一行前脚刚走，立时就有几个政治小丑跳到主席台上叫嚷：“台湾不是香港，台湾独立万岁。”但很快给与会代表轰下台。据了解，那一段时间，台湾各地“台独”分子利用各种机会，纷纷跳出来掀起一股“反中”的恶浪。看来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确实深深刺痛了他们的神经。回沪后，在我们的访台报告上，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领导做了重要批示，将这次我们的行动方案称为行之有效的“上海模式”。

在台访问期间，我们甚感兴趣的是岛内劳工领袖凭什么开展工作。想不到如此复杂的问题，台湾同行以“三头”作了高度概括：即口头、笔头和拳头。具体诠释，内容颇多，口头：滔滔不绝的演讲，煽动激情的鼓动，才能将一盘散沙捏起来。口头还有另一层含义，劳工的粗犷充分体现在酒量上，一瓶50°、60°的白酒，三下五除二，一仰脖子就可喝完，那是身为劳工领袖，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基本功。笔头：更为重要。行文达辞，挥笔

谋篇,或造势,或辩论,必不可少。拳头:其内涵不言自明。劳工受人雇佣,长期受压,为争生存权、立法权,以拳相争,流血抗争是常有的事。全程陪同我们的高雄市总工会理事陈永昌不无感慨地以实例佐证:过去台湾计程车(即出租车)行业有个怪现象。汽车好买,车牌却无处可觅。仔细一查才发现,有人用钱贿赂管理部门官员,把一大把车牌放在自己名下,高价待沽,不轻易出售。失业者想开计程车谋生难于上青天。我一气之下,一个号召,几千名劳工开车昼夜兼程赶到台北“行政院”。上午9时“院长”办公之时,汽车喇叭齐鸣,震耳欲聋。数分钟后,又与“镇暴”的警察一阵肉搏打拼。几次拉锯战后,迫使有关部门放弃恶规。

依此看来,口头、笔头、拳头,应属台湾工会干部必备的文功与武功。

“中钢”环保先行

由于上海拥有现代化的宝山钢铁总公司,因此对参观台湾最大的钢铁企业——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自然倍感兴趣。香港即将回归,给沪台经济往来提供了更多便利。事实上,沪台这两家钢铁企业颇有缘分,1996年起,宝钢有70名员工悄悄在“中钢”接受电脑软件开发的系统培训。香港回归的特大利好,使“中钢”高层放开畏缩的手脚,准备待来年培训结束,派高级工程师赴宝钢现场指导。

在台参观,主人接待有一不成文的三部曲:先放映有关录像,接着由主人回答客人提问,随后陪同客人现场参观。参观“中钢”亦属此规。对于一个具有26年历史的大型钢铁企业,我们自然很关心如何做好环保。看来主人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早有所准备。在精心制作的“中钢”录像中,特别强调本年度所投入的污染防治费用为23.53亿元,主要用于第六氯气工场噪音防治工程,第一炼钢厂建屋集尘系统工程,热轧工场三、四号加热炉燃气

旁通系统增建工程等。20分钟的录像一放完,万万没有想到,主人启口的第一句话便是自揭“家丑”：“我们所做的并没有拍摄的那么好。”短短一句大实话,就给宾客留下了谦逊、平实的印象。

既是大型钢铁企业,就当时科技水平,多多少少对周边环境总有一点污染。在全球范围内,因污染环境,有不少大型钢铁企业与周边地区关系不协调,甚至矛盾百出。在这方面,作为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有何妙法?主人对这个话题既回避,也不保密。“中钢”棋高一着地成立环保监督委员会,所礼聘的几十名义务环保监督员,几乎清一色的是邻近地区居民。该委员会的重大活动除了每天24小时的环境监督外,还一年数次举办环保监督员集中巡视活动。活动一开始先组织参观企业,让监督员作一实地了解,亲眼目睹公司新近在环保方面所作的诸项努力,这就大大拉近了原先矛盾双方的距离。而别开生面的睦邻活动之一——儿童环保夏令营,更使人大开眼界。小营员皆来自公司周边地区,教师组织大家做环保游戏,表演环保节目,使环保意识从小深入人心。暑假期间,一日三餐由“中钢”提供,家长们无后顾之忧,孩子们玩得高兴,又何乐而不为?

这些人性化的做法直至今日仍为上海大型企业效法,并深感符合“以人为本”的环保潮流。

爱河传奇色彩

高雄爱河,一条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河流。我们居住的五星级国宾大饭店坐落在爱河边,每天倚窗而望、离店外出,率先映入眼帘的必是爱河。

在高雄人的眼中,蜿蜒几十里、绕城而过的爱河绝对是一条须臾离不开的母亲河。我无论如何学不会他们的发音。他们讲起“爱河”,把“爱”字讲得特别重,特别有情感,让人



▲高雄爱河

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母亲河在高雄市民心中的地位自然不容置疑，而长期以来它一波三折的经历竟与上海有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河是一条真正的爱河，情侣双双携手出没爱河。爱河两侧成了恋者私语、幽会的胜地。凡去过上海的高雄市民，谈及这段历史，就会拿上海外滩作比喻。60年代爱河河畔的浓浓浪漫色彩，就如外滩情侣墙一般。国宾大饭店一位鬓发斑白的经理回忆起与太太的昔日恋情，笑指窗前的爱河说道，是爱河向我们射出了丘比特之箭。

可如此一段浪漫时光不久就消声匿迹。随着高雄大工业圈兴起，从上世纪70年代起，热情奔放的爱河竟成为废物废水恣意倾倒地。才几年，一条好端端的河流就面目全非，人们避之不及，只得掩鼻匆匆而过，污水横流的恶臭使爱河变为恨河。还是一位社会科学家聪明，他力主将爱河改名为仁爱河。既然此河已无可爱之处，那就呼吁大家手下多多留情，多给母亲河一点仁爱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使上海充满了活力，一批批高雄观光客相约飞抵沪上观光。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外

滩是他们的首选地，亲眼目睹外滩一天天在变，越变越美，久已熄灭的“爱河之曲”重又在心底唱起。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游行，沸腾的民怨不可阻挡，高雄管理部门无法再敷衍拖延，作为整治的序曲，爱河又恢复原名。从这天起，5年断断续续的治理，耗资几十亿元，终使爱河一改丑陋的旧貌，久违的鱼群重又悠悠地漫游，小鸟欢叫在绿荫之下。为突显自己的“政绩”，当时的市长对爱河大作文章：端午节龙舟大赛办得沸沸扬扬；假日垂钓者聚会又刻意宣传；更有甚

者，为显示爱河已清洁美丽，专门组织了一场环游爱河的游泳比赛。市长等一应人物扑通扑通一个个跳入河中游泳……

“爱河是否可爱？”在高雄期间，不少朋友见到我就爱问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只能相视而笑。爱河的变迁，饱经历史的风雨，高雄市民的智慧才干从中可见一斑。但爱河的治理是否已大功告成？中午时分的爱河对此可作明确的回答：太阳曝晒，河水蒸腾，异味扑鼻，避让不及。是我一个外乡人无法适从，还是本地人习以为常？凡亲临爱河者自然明白。政治作秀决不能替代河流整治。在香港回归之际，多次到上海、大陆参访的高雄朋友见到我们总会翘起大拇指说：共产党就是有能力。上海苏州河的污染如此严重，短短几年整治就有起色，面貌日新月异。150多年的香港回归之梦今又实现，大陆实在太了不起了！

台湾“南极”奇观

去鹅銮鼻，是主人在我们刚抵高雄时就安排的一个重点节目。我只知道它地处四季如春的恒春半岛的南端。当陪同的陈先生将其称为台岛的“南极”时，我对它的企盼又多

了几分。

鹅銮鼻,还真像它的名称一样有点怪。那天下午,车抵鹅銮鼻,我迫不及待地一下车就往海边跑。可人到海滨,却怎么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亏得陪同提醒,人往后退出几百米,再登高眺望,一幅奇景才显现在眼前:一条长约4.5公里、宽近2公里的山脊,宛若白鹅鼻子上高隆起的一堆肉,呈翻越状,一直延伸到碧绿的海水之中,将太平洋、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分割开来。它的高山族语是“船帆”的意思,又清楚地表明这儿是渔产丰富的大渔场。

人到鹅銮鼻,在尽情欣赏茂盛的热带林木的同时,领教最多的是来势迅猛、去无踪影的太平洋飓风。此风之猛可能你不相信。我想为同伴留影,可风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你推得东倒西歪。狼狈之余只得随机应变,看准了背景,人一上就拍,百分之一秒的提前量对摄影技术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见缝插针抓拍的同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此处高大的热带林木,如椰子树的树干一律向西倾斜,每当飓风刮来,更是竞相向西折腰。陪同的讲解亦十分有趣:此处的树木也富有人情味,一水之隔的大陆在台湾的西面,它们向西竞折腰,是时时刻刻热忱欢迎大陆同胞来访。

说及鹅銮鼻,必然会谈到每隔10秒钟自动闪亮一次、光力可达到20海里的远东最大

的海上灯塔——鹅銮鼻灯塔。此灯塔是中国战败的赔偿品,它的建成标志着台湾门户的洞开。1867年,美国罗弗号商船在台岛南端的洋面触礁沉没,乘小船逃生的水手在鹅銮鼻处摸黑登陆。当地的高山族同胞误认为是海盗袭击,一场不明就里的冲突发生后,竟导致侵略军大动干戈血洗恒春半岛。腐败的清廷在入侵者的压力下,被迫赔偿白银40万两,以其中的一部分赔款修建了鹅銮鼻灯塔。白色圆柱炮塔型建筑矗立在海边。灯塔的四周挖了壕沟,并派武装士兵守卫,于是就成了全球唯一的武装炮塔型灯塔。如今,昔日的一切已不复存在,可充满火药味的独特建筑仍不失为一大奇观。它在时时提醒人们:落后必然挨打。只有国强才能抵御外辱。

沿着坐落鹅銮鼻的垦丁公园往北走,蓦然间,一片辽阔无边的大草原展现在我们面前。台湾竟然还有大草原?!我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此刻一望无际、蔓蔓青草丛中正演绎着一群男追女的动人场景:身披白婚纱的新娘脚登高跟鞋咯咯咯地笑着在前面跑,西装笔挺的新郎官夸张地迈着舞步快速追。我们一行“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用力击掌为双方加油。

何谓“槟榔文化”

未去台湾,任凭你天马行空,驰骋遐想,都无法想象“槟榔热”在岛内究竟有多热。当你抵台一下飞机,随着滚滚的车流在宝岛公路疾驰,沿线两侧迎面扑来的一块块光怪陆离的店招:“潘多拉”、“俏小姐”、“神仙翁”……真叫初来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旅游大巴的司机眼睛一点不会走神,他认准了哪家店,驶过去吱的一声停下来。我们伸长脖子向窗外一看,哟,这不就是台湾赫赫有名的槟榔店吗?

走遍台湾,几乎所有的槟榔店的“硬件”极其简单,独立的玻璃小屋内,一台冰柜、一



▲鹅銮鼻灯塔



▲ 槟榔西施在向路过的司机兜售槟榔

张桌子、一个高脚凳,仅此而已。入夜,小屋外霓虹灯艳丽的灯彩梦幻般地不停变换,予人半醉半醒之感。可小小的槟榔店的“软件”就不一般,只要一看到车停、人来,久享其名的“槟榔西施”便小鸟可人般飞也似地扑过去,在温柔地递上各种款式的槟榔的同时,一股浓烈的香气不由分说迎面袭来。不知何日,“槟榔西施”的靓丽身影,竟堂而皇之地构成了台湾“槟榔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俨然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两侧流动的“人文风景线”。

谈起槟榔,顾名思义,其为槟榔树的果实。以学科划分,与椰子同属棕榈科植物。宝岛盛产槟榔,历史源远流长。随着嚼槟榔在岛内迅速成为时尚新潮,受强烈刺激的槟榔业一年比一年风光起来,以至上世纪90年代,全台种植面积竟高达5万公顷。台湾中南部

的丘陵、平原一带,四处可见躯体笔直、高高挺立的槟榔树。可奇怪的是,若你有心问及此树的得名,产地几乎无人能予回答。还是台湾大学的教授经考证给了我一个权威的答案:中国古时尊称贵客为“宾”、“郎”,“槟榔”美名就由此而来。

在台十余天,“槟榔热”热浪冲天,令人震惊。随团的台方接待人员几乎人人嘴不离槟榔,而司机更是十足的“槟榔迷”,从早到晚,除了吃饭,一刻都离不开“台湾的超级口香糖”。受主人的一再怂恿,那天晚饭后,就在餐桌旁,我欲斗胆尝新。盘中裹着槟榔的绿叶竟刷了厚厚的一层石灰浆,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没关系,这种槟榔特别刺激、耐嚼。”领队李先生在一旁轻声点拨。真是不尝还好,槟榔一入嘴,刹时间一股浓烈的涩、苦混合味不由分说直冲脑门,呛得我连忙一口吐了出来。态度坚决的肠胃更来了个严重抗议,翻江倒海地将所进的食物全部吐出还嫌不够,弄得第2天整整一天不敢贸然进食。

如此教训极为深刻的启蒙课使我视嚼槟榔成瘾的大巴司机为不可思议的尤物。而当我进一步得知仅2100多万人口的海岛,竟有600多万“槟榔族”醉迷此物,乐此不疲,却无视一年白白消耗掉几千亿元的社会财富;极难清洗的一滩滩猩红的槟榔渣成了城乡环境的污染源;更可怕的是每年徒增上万名痛苦的口腔癌患者,给寻常百姓家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难怪台湾的有识之士对此要大声疾呼:变味的“槟榔热”早该休矣!社会学家率先撰文愤怒鞭挞,继而是社会各界上街游行,要求一扫丑恶的“槟榔西施”,并开展全民“拒嚼槟榔运动”。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

责任编辑:翁泽红



大跃进时期的 “白旗”板话

张志善

荒唐岁月多荒唐,猪耳可当飞机场。板话写下真历史,警示后人切莫忘。

我是山西绛县东吴村人,年逾花甲,亲历了本村大跃进时期的一些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王姓社员有感而发的板话。老王那时40来岁,出身贫农,能言善说,出口成章,且通俗押韵,生动形象,朗朗上口,近乎于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主人公李有才。尽管老王当时为此被“拔了白旗”,受到批判,吃尽苦头,但是他随口拈来的一些十分形象的板话,却极为辛辣地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的虚假、浮夸现象,在村内乃至周围一带流传极广。

当时,为了大炼钢铁,村里出动民兵,挨家挨户将柜子、桌子、箱子上的铜质、铁质开关、把手、合页统统取下来,简单登记后,收走去炼铁,甚至连铁锅、铁瓢也不能幸免,真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说是以后折钱返还,实际上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再不见踪影。结果,好端端的家什,全变成了一锅锅黑糊糊的铁水,干

部急忙拿去报功。老王心里有气,编道:

村里大炼钢,家具遭了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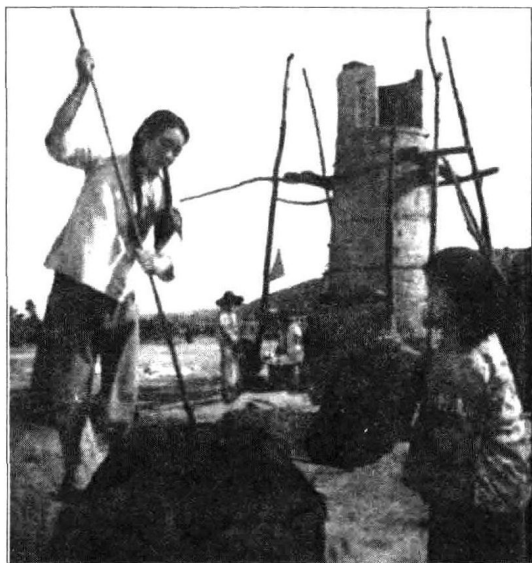
柜子没了门,箱子开了窗。

锅瓢变碎铁,处处留痛伤。

在大炼钢铁中,各地都抓典型,创奇迹。我村也不例外,有一陈姓木匠参与炼钢铁,被宣传成外行炼钢铁的模范,有位袁姓姑娘热



▲把家里的铁器上缴作为大炼钢铁的原料



▲妇女钢铁厂的妇女们正在炼钢

情高，劲儿足，被戴上“炼铁技术员”的帽帽。他们曾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并在《绛县小报》上露了脸。老王知道底细，顺口表道：

自古炼铁是铁匠，谁不清楚谁不懂？
如今开展大跃进，随时随地出洋相。
木匠用的斧和锯，居然练出铁和钢。
姑娘上炉才三天，就说技术倍儿强。
脸上贴金为装人，不怕颜面臊得慌。

为了适应当时“全党总动员，全民齐参战”的大跃进形势，村里除年老体弱者和儿童外，其余青壮劳力，不分男女，不管情况，统统上东山参与大炼钢铁。结果，到秋季，村里一些老弱病残根本无力收秋，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在地里烂去。老王心疼地说：

高粱站了哨，玉米上了吊。
豆子放了炮，棉花戴了孝。

配合“大跃进”、“放卫星”的政治需要，民歌成了当时十分时髦的东西，在我村就曾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公社粮食堆成山，社员爬上当神仙，扯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一头肥猪大叉长，猪身横跨太平洋，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老王看不惯，背地里表道：

吹大话，使小钱，干实活，一点点。

说谎不报税，牛皮吹上天。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违背自然规律，悖于科学常理，虚捏数字，谎报成绩者屡见不鲜，亩产“千斤棉”、“万斤粮”的比比皆是，当然本村也未幸免。尽管队长保守，但是也见风跟潮地糊弄着上边，不然要挨板子。而老王对其中的一些猫腻心知肚明，所以，他讥讽道：

队里放卫星，亩产万斤粮。

十亩并一亩，连壳带草称。

干部脸上乐，社员肚里空。

那年冬天，村里办公共食堂，老王家的房子大，队长让他腾出来。老王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可奈何地搬到一破烂小房。但是心里有气，不禁发泄道：

数九寒天，把我撵到猪圈。

小不点点，又破又烂。

前边锅台后边案，开门只能开一扇。

睡觉没有炕，黑夜桌上躺。

我那时年龄小，记得当时的公共食堂以煮着胡萝卜、油菜根的稀玉米面糊糊为主，胡萝卜、油菜根吃得多了，直倒胃口。所以舀到碗里后，常常先拣出来给了大人，最后只剩下少半碗稀汤，哪里能填饱肚子？于是便寄希望于母亲晚上加班，因为加班时可以额外领到两个用棉柴壳或玉米皮和淀粉混做的所谓



▲人民公社社员正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跃进馍”，母亲往往舍不得吃，总是让我们解馋。其实，村里众多家庭与我家并无二致。老王编板话反映这种情形：

玉米糊糊照见影，一天三顿不变样。
萝卜、菜根一捞完，仅仅剩下一点汤。
喝到嘴里不知味，还不够那填牙缝。
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炕。
连饿带气发了火，一掌打到街门上！

就是在这样忍饥挨饿的状态下，还得勒紧裤腰带坚持天不明上工，中午排队领饭，晚上队里开会，干不完的活，开不完的会，照群众的话来讲，就是“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可种一葫芦收一瓢，社员的生活未改善，反而不少人得了浮肿病，甚至被饿死。可能是老王忌讳可怕的结果，对得病、死人的事儿没有提及，他表道：

天亮出工扎堆，中午食堂排队。
晚上队里开会，整天忙得死累。

老王是普通的农民，他不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左倾路线作祟，他不可能、也不敢从根子上找问题，只是出于农民诚实、朴素的本性，发挥自己能言善说的特长，从表面上揭示了一些社会现象，即使如此，对当时蛮干冒进、虚假浮夸的不良风气给予了尖锐、深刻的讽刺和鞭挞。他认为之所以如此，和一些干部不顾群众死活，一味迎合上层，片面追求政绩工程，企图挂花得奖不无关系。因而，他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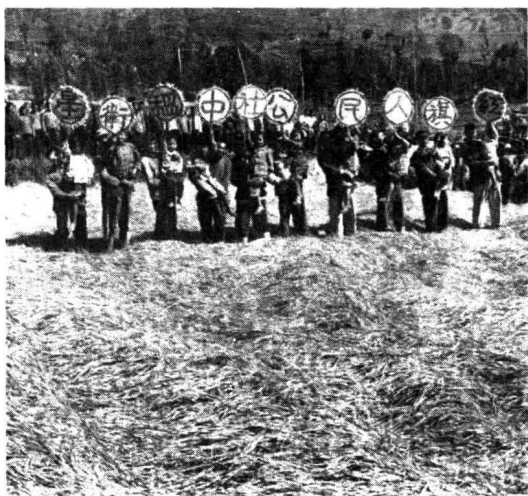
干部昏了头，光想出风头，
吹牛过了头，百姓吃苦头。

他的板话传到了队长耳朵。队长叫屈说：“没法，人家上头往下压得紧，咱不紧跟着，能行吗？”老王脑子快，马上又来了一首：

上峰压下峰，一峰压一峰，
峰峰加码，马到成功。

基层骗上层，一层骗一层，
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老王这说



▲稻谷上可以站大人加孩子

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想起来舒心、栩栩欲活、生动形象的板话。所以他的板话越传越远，终于传到一个公社领导耳朵。公社领导勃然大怒，要追根溯源，深挖其出身，说什么“这是和社会主义唱反调，对着干哩”，扬言“要将他送进监狱”！幸而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老王系货真价实的贫农，根正苗红，就是嘴碎，爱说个闲话。”揪不住头发拽耳朵，纵然如此，也不能轻饶。恰巧公社要开展“举红旗、拔白旗”运动，老王理所当然地成了“白旗”典型，从此凌晨扫街，白天下地，晚上接受无休无止的批判，可怜40来岁，就腰弯背驼，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小老汉，于文革前患病逝去。文革中他家人曾庆幸地说：“多亏老人走得早，不然现在又要遭一次罪。”

老王虽然故去40多年，但是他编的板话却未因时日久远而流失，相反历久弥新，愈传愈远。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的民声，揭露了浮夸之风的种种劣行，也折射了人民群众不甘糊弄、逆风而行、苦中取乐、积极斗争的勇气、智慧和精神，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作者单位：山西绛县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姚胜祥

遵义会议前夕被起用的 四位红军将领

张小灵

长征途中的黎平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说，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以来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以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朝遵义进军的战略方针。伴随着毛泽东发言权的逐渐恢复和影响力的逐渐增强，在遵义会议前夕，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即起用了部分受“左”倾领导人错误处分的干部，为接下来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黎平会议上 被起用为中央秘书长

1932年7月，邓小平被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邓小平和

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抵制。他们支持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邓、毛、谢、古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勇敢地指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

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所不容。1933年春至夏,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4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而邓小平还被指为“毛派头子”。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起来源”的“机会主义”,责令邓小平向中央局写出《会寻安工作检查》。3月31日,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5日,被撤销职务,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

1934年10月,邓小平被允许随队长征。1934年12月,从湖南通道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渐有了发言权,邓小平的境况也随之逐渐改善。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出席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在会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变化,邓小平的职务不断擢升。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内,又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刘伯承:黎平会议上 被重新起用为红军总参谋长

1932年10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30号命令,任命

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随即,刘伯承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作战。1933年9月,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很快同当时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结合在一起。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成为李德的幕僚。1934年10月,刘伯承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10月20日,五军团开始长征。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认为刘伯承经验多阅历深,经过大的阵仗,行军作战倚重他,所以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刘伯承对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非常尊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在长征途中,他办起了参谋训练班,以培养参谋人才,加强司令部建设。他把部队中粗通文墨的青年组织起来,每天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给他们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在过湘江时,他看到牺牲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在后来的《回顾长征》一文中,他描述了他和广大干部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在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东部。12月17日,军委纵队进入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

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决定重新起用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刘伯承受命指挥二师强渡乌江,亲自指挥以夜袭方式智取遵义,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创造了先决条件。

杨至成:黎平会议后受命 组建地方工作团解决后勤问题

杨至成,侗族,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统管全军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指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增加收入。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卓有成效地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随后,“紧跟”毛泽东的杨至成也受到牵连。“左”倾领导人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时,以杨至成“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为名,在1934年5月宣布撤销了他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的职务,贬为负责军容风纪的队列科长。在杨至成受到批判时,毛泽东虽已处境艰难,但还是为他讲了公道话,解除了杨至成的险恶处境。

1934年10月,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参加



▲杨至成

长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边城黎平。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确定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后,红军分两路向北向西发展,准备去开辟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而红军转战的黔东南这一带地区正是杨至成的家乡,地瘠民贫,当地老百姓从未见过红军,又受反动宣传的蒙蔽,不少人躲进了深山,并藏起了粮食。红军的生活一时间产生了困难。离家已经12载的杨至成正在想着怎样打开局面时,周恩来同志找到了他:“至成同志,我们来到了你的家乡,你用什么招待我们呀?”杨至成窘迫得满脸通红,还未吭声,周恩来就“哈哈”大笑道:“你对我们最好的招待,就是把老乡们找回来,把他们发动起来,协助我们部队搞好后勤工作。”

杨至成听着心中十分高兴,说:“周副主席,我正有此意,一下就让你说着了!就